

新闻会客厅

复古经济

□本期主持人:于理

主持人:据中新网报道,时下,年轻人中刮起了“复古”旋风。听沉淀多年的老歌,刷剧时时代印记的老剧,淘带着生活温度的老物件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甘心情愿,乐此不疲地为这场直戳内心的“回忆杀”买单。艾媒数据显示:2025年中国复古经济市场规模已达3552.2亿元,同比增长11.7%,预计2030年,这一数字有望攀升至5878.5亿元。怎么让“复古经济”行稳致远?

本期嘉宾:孤烟直、王贤永、贾选慧

一剂温和解药

□孤烟直(评论员)

复古消费成为青年群体中的新风尚,表面上,是老旧物件重新回到大众视野,深层来说其实是当代年轻人精神状态与价值取向的直观投射。

当下社会发展提速,生活里的不确定性与日俱增,职场上的竞争压力、日常生活里的琐碎烦恼层层叠加,让不少年轻人长期处在精神紧绷的状态。与此同时,日新月异的新事物不断刷新着我们的认知,新技术、新概念、新潮层出不穷,刚刚适应一个风口,下一个浪潮便又扑面而来。这种持续的新鲜感背后,也容易让人生出无所适从、漂泊无根的失重感。

复古消费恰好给了年轻人一个情绪疏解的出口,成了调剂快节奏生活的一剂温和解药,年轻人借由这些熟悉的时代印记,让自己暂时抽离繁杂的现实处境,偷得浮生半日闲。

从消费理念的维度看,这服复古热潮其实也标志着大众消费观念的悄然进阶。当消费选择从单纯满足生理与实用需求,转向观照内心的情绪感受,情感价值成为左右消费决策的关键因素,也是消费观念走向成熟、回归本心的表现。

谨防情怀收割

□王贤永(职员)

复古经济火热,老歌翻红、老剧翻新、老物件翻红,年轻人愿意为记忆买单,这本是一件好事。但越是热闹的时候,越要警惕一个陷阱:把复古当成收割情怀的镰刀。情怀这东西,割一茬少一茬,等信任耗尽,这个风口也就到头了。

市面上的问题已经露头了。有些商家手里攥着的不是好产品,而是一套“话术模板”。品控让位于叙事,价值附着于标签。但凡沾点年代感的东西,都往“复古”的筐里装。二手市场上,一台十多年的旧相机,功能残损、成像靠运气,但只要贴上“CCD”“胶片感”的标签,价格就能翻上几倍。服装领域也一样,库存积压的旧款,换个“古着”“千禧风”的名头,溢价就来了。商家卖的,不是商品,是“故事”,至于这些“故事”靠不靠谱,用完即弃。

复古经济要走得远,不能只靠贩卖记忆,得靠承接记忆。贩卖记忆是消费过去,承接记忆是延续过去。这两者有一个本质的区别:你有没有给旧的东西注入新的诚意。一盘老歌的磁带可以复刻,但如果音质稀烂、包装粗劣,就是贩卖;如果能用更好的技术修复音源、以更用心的设计还原那个年代的质感,就是承接。一件致敬旧时光的衣服,不是把旧图翻新出来照做一遍,而是在保留那个年代审美的精髓上,用更好的面料、更合身的剪裁让年轻人愿意穿出门。

说到底,消费者是在用钱包给过去投票,但商家不能用过去的标准来回应这份信任。情怀是入口,入口之后的路,得用扎实的品力来铺。把怀旧做成细水长流的生意,而不是割完就跑的买卖,这阵风才能留得住。

深挖文化内涵

□贾选慧(教师)

复古经济要行稳致远,除了真诚、创新,还要学会“赋能”——尤其是赋能那些沉寂已久的年代文化资源,让它们从故纸堆里走出来,变成可消费、可体验、可传播的文化资产。

复古经济眼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?是“有场景、没内容”。年轻人有怀旧的需求,市场有消费的热情,但供给端能拿出来的,往往只是一些零散的老物件、几张模糊的老照片、几段被反复咀嚼的老旋律。这些东西当然有价值,但也过于单薄。一两次打卡拍照之后,复购的动力在哪里?更深层的文化体验在哪里?如果我们只是把复古当成“旧货翻新”的买卖,那这门生意很快就会撞上内容的天花板。

破局的关键,是把那些躺在档案馆、博物馆、老厂房里的年代文化资源重新激活,赋予它们商业生命。比如老厂房,它真正的价值不在砖瓦和钢架,而在它见证过的那段历史、承载过的那些人。这个厂房曾属于哪个行业?那条流水线上站过哪些工人?厂区大喇叭放过哪首歌?复古经济,就是把那些被遗忘的细节梳理成可感知的叙事,让锈迹和标语都变成展品。当消费者走进来,身处的是一个有来历、有温度、有故事可讲的文化场域,消费的就不仅是一杯饮品,而是一段可以沉浸的旧日时光。

积分治乡,“村事”变“家事”

□温文清



“做些好事,或者将周边环境收拾干净,都能记上积分。”“累积一定数量的积分后,可以到村里的积分超市兑换日用品。”村民老林对记者说。据本报报道,在安溪县官桥镇驷岭村,自从村里推行积分管理以来,村民参与公共事务、志愿服务的积极性明显提高,大家争相攒积分、讲文明,整个村子的氛围也变得更加融洽和美。

据报道,驷岭村的积分治理探索,最初始于对党员的要求,后进一步扩展至人居环境领域。今年,该村再次对积分制度进行提档,将移风易俗、孝老爱亲、邻里和睦、遵纪守法等各方面纳入积分评价体系,营造出“人人争积分、户户讲文明”的浓厚氛围。

驷岭村的积分治理,是推行乡村治理“积分制”的一个缩影。自2020年以来,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》精神,激发群众内生动力,探索乡村治理新路子,制定了推行乡村治理“积分制”工作方案,将乡村治理各项事务转

化为量化指标,引导农民群众主动参与公共事务,对农民日常行为进行评价形成积分,并给予相应精神鼓励或物质奖励。“积分制”的实施,带来我市乡村面貌和乡风民风的显著改善,实现了村民从“被动管理”到“主动自治”的转变,让“村事”变成村民自觉参与的“家事”。

如今,“积分制”在我市已覆盖一千多个行政村,成效显著。当然,在推广过程中也会存在一些问题,需引起重视,才能让制度更加长效。

首先是因地制宜、一村一策。要坚持党的组织领导,加强对积分内容、评价方式、结果运用等环节把关,保障“积分制”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。成功的“积分制”,并非简单套用模板,而是要立足本村实际,一村一策。放眼外地,江苏泰州市蒋垛村甚至结合红色底蕴与特色产业,将瓜蒌种植、红色资源挖掘写入规约;安徽亳州谯城区为低彩礼、零彩礼家庭一次性赋予高分,引领村民移风易俗。这种因地制宜的设计,确保了积分项目既接地气又惠民心。

其次是发动群众、广泛参与。要依托村民自治组织和各类群众性协商活动,将积分的主要内容、评分标准、运行程序等,交由群众商定,坚持积分内容群众定、积分方式群众议、积分结果群众评等原则,确保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,维护民主权利。我市乡村治理“积分制”推行以来,以规范引导村民日常行为,引导

向好向善为基本原则,将积分管理与“美丽庭院”“文明家庭”“诚信户”等评优评先挂钩,让普通群众有了参与村庄治理的平台,进一步激发了村民践行社会公德、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。

再次是即时激励、可见可得。村民每做一件好事、遵守一项规约,应获得相应积分。要借助数字手段,让即时反馈机制看得见、摸得着,使村民明确知晓“该做什么、怎么做、有什么好处”。除了传统的米面油、日用品等生活物资兑换外,还可拓展更多服务和精神类的激励。如,黑龙江饶河县推行“时间银行”,村民可用积分换取相关奖励服务;安徽老家村针对留守老人需求,提供理发券、澡票等服务。吉林省通化市兴华镇,将“积分制”与“道德模范”“文明家庭”评选挂钩;陕西宝鸡市下凉泉村,还探索了“积分制”与集体经济分红相结合,实现治理效益与经济利益的双赢。

总之,乡村“积分制”已不仅是简单的奖励工具,它更是重塑乡村社会关系、培育文明乡风、提升治理效能的系统工程。未来,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创新,“积分制”将继续发挥“小积分撬动大治理”的作用,为我市推动乡村振兴、促进共同富裕注入持久的动能。



长期“脏盘”待客 网红餐厅失守底线

□廖卫芳

近日,“杭州一寿司即被查,盘子10抽10脏”的话题冲上社交平台热搜。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,2026年1月5日,执法人员在某门店厨房专区随机抽查10只铝盘,全部残留大量水渍与食物残渣;一个月后复查,10件待用餐具有6件仍沾有饭粒残渣。(5月26日《工人日报》)

消费者到网红餐厅消费,除了品尝美食之外,更看重的是餐厅的饮食卫生和健康安全,其中最直接的当属餐具。根据《餐饮具消毒管理制度》规定,餐饮具应首选热力方法进行消毒,严格按照“除残渣、洗涤剂清洗、清水冲、热力消毒、保洁”的顺序操作。使用化学药物消毒的,严格按照“除残渣、洗涤剂清洗、清水冲、消毒液浸泡、清水冲、保洁”的顺序操作,并注意要彻底清洗干净,防止药物残留。

职能部门应积极承担起监管的主体责任,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常规检查和监督,发现问题及时制止,规避类似“脏盘子”乱象,确保广大消费者的饮食卫生和健康安全。对网红餐厅的“脏盘子”乱象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,发现一起严惩一起,不妨通过高额罚单、列入“黑名单”、停业整顿,甚至从业禁止等多种处罚机制,让其付出沉重代价。消费者一旦遭遇“脏盘子”,既要坚决说“不”,又要积极主动地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,切忌忍气吞声,任凭无良商家肆无忌惮地用“脏盘子”待客。对于网红餐厅而言,要想把生意做好、做大、做强,更需先把盘子洗干净,用干净卫生的消费环境赢得消费者的信任。

职校“热潮”背后 人才生态深刻重塑

□孔德洪

近日,北京昌平职业学校校门凌晨三点便排起长队,家长们只为抢抓自主招生面试名额;此前广州“3+4”中本贯通试点仅40个招生席位,却引来6366人踊跃报名。更值得关注的是,不少本科毕业生选择重返校园、攻读技职补齐技能短板。(5月26日《南方日报》)

长期以来,职业教育被贴上“兜底教育”“无奈选择”的标签,“学而优则仕”的传统观念与“唯学历”的评价体系叠加,让很多家庭把普通高中、考大学当作唯一出路。职校被视为“差生聚集地”,技能成才不被看好,技术岗位缺乏尊严。

如今风向渐变,职校从“冷板凳”坐上“热炕头”,背后是三重深层变革。产业升级催生刚需,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,先进制造、人工智能、集成电路等领域对高素质技术人才求贤若渴,技能人才“定价权”持续上升。教育赛道全面打通,“3+4”中本贯通、职教高考、职业本科扩容,技能人才不再是“断头路”,升学就业双通道并行。社会观念理性回归,家长从“盲目追高”转向务实选择,不再唯学历是举,而是立足孩子禀赋,选择适配赛道。

职教的价值在于把动手能力、实践天赋转化为职业竞争力,培养能工巧匠、大国工匠。但也要看到,当前职校火爆集中在少数优质院校,多数职校仍面临办学质量参差、师资薄弱、产教融合不深等问题。若只重规模扩张、招生热度,不抓内涵建设、育人内功,流量的潮水终将褪去。此外,社会层面“重学历轻技能”的惯性仍在,用人机制未根本扭转,技能人才的职业尊严、薪酬待遇、发展空间仍需提升。

ATM机锐减 期待功能改造升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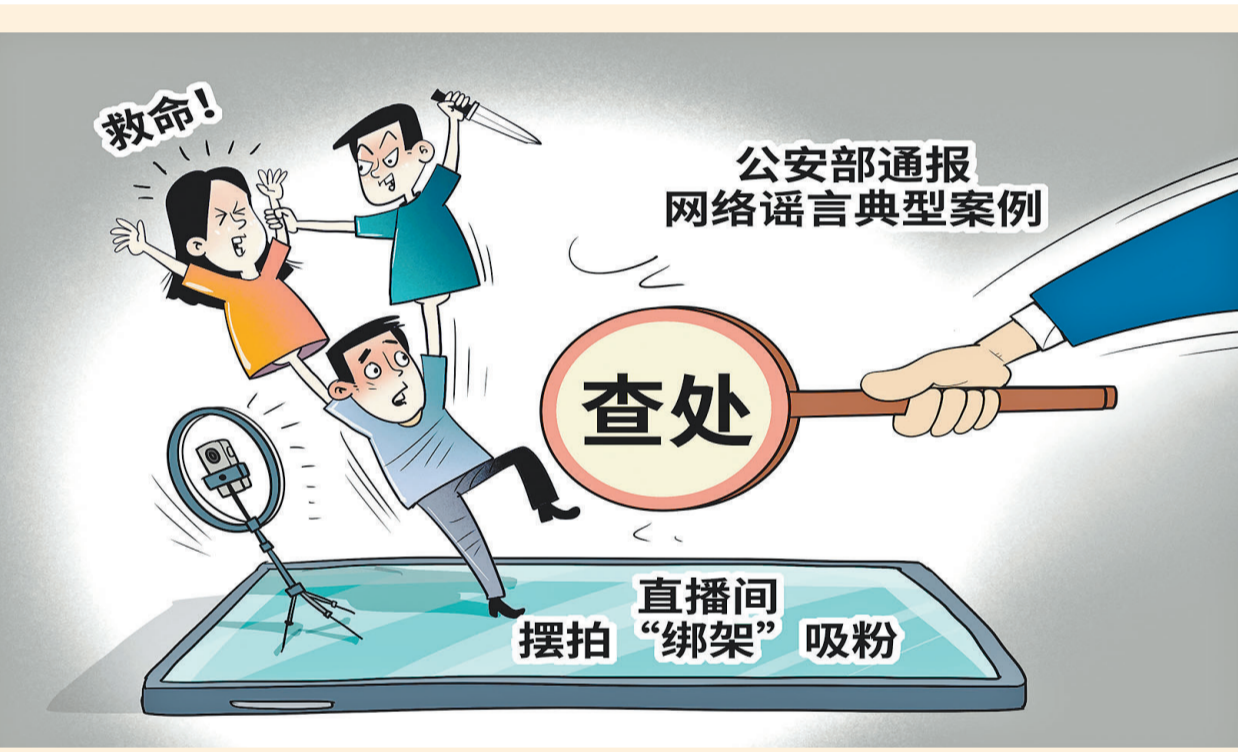
□戴先任

“你多久没用过ATM机了?”当把这个问题抛给身边的年轻朋友时,得到的答案大多是“好几年”或是“记不清了”。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印证了这一趋势:截至一季度末,全国ATM机具数量已降至72.58万台,较2025年四季度末减少了1.99万台,较2018年三季度末的历史峰值减少了40.28万台。(5月26日《经济日报》)

随着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,储户已经习惯通过手机App转账,到ATM机存取款没有手机操作方便,现金交易也没有移动支付省心。这导致到ATM机存取款的人越来越少,也让ATM机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。不少银行也考虑到了运营成本,开始减少ATM机数量。

面对ATM的衰落,ATM行业在积极应对。生产厂商积极寻求转型,提供智慧银行综合解决方案,单一功能的ATM机锐减,但更为智能的VTM(远程视频柜员机)或者ITM(互动交易模式)即将兴起。通过转型,ATM机升级换代,有望更好应对时代潮流的冲击,推动与时俱进。除此之外,有的地方还通过增加ATM机办社保缴水电费的功能,加快适老化改造,让ATM机这一在城市逐渐受到冷落的机器激发了新的作用,赋予新的任务与功能。

让ATM机发挥出更多作用,增益民生,能够“留住”不断减少的ATM机,就像一些城市将街头电话亭改造成“悦读亭”、5G小微基站、公共信息服务亭一样,对公共空间、公共设施进行优化配置与充分利用,体现的也是城市管理者的精细化治理能力和管理智慧,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务水平,更好地便民利民。



公安部网安局近日集中通报5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。此前发生在江西的直播间虚假摆拍“绑架”谣言案件在列,相关违法行为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。

法律界人士提醒,根据刑法、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,故意散布谣言,谎报险情、疫情、灾情、警情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,将被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(新华社/文惠清/图)

决不让恶意举报者得逞

□曾于理



近日,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因在直播中为一名家长分析“校园欺凌”问题,被对方连续举报。家长们说自己的孩子受到了欺凌,沈奕斐了解之后发现孩子遭遇的只是零食没有得到回应、拌嘴的时候互相推搡等情形,指出这不符合法律规定以及教育学的欺凌定义。家长不满这一专业判断,转而向复旦大学层层举报沈奕斐,指控其直播连麦侵犯隐私、影响教学等。好在,校方调查后认定沈奕斐无过错。

在教育领域,家长动辄举报教师的现象已相当普遍。据《半月谈》报道,西南某基层教育局2024年前8个月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,经调查仅7起基本属实,查证率不足5.5%。恶意举报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教育行业当中,它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问题。比如在政务方面,有些公职人员在依法履职的时候会遭到服务对象恶意举报的情况;而在职场上,因为个人恩怨或者竞争关系所导致的诬告陷害也时有发生。

举报是公民的一项合法权利,其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监督,尤其适用于对公职人员履职行为的监督。但是举报权的行使是有条件的,即,要有事实依据,不能凭空捏造,不能成为泄私愤、图报复的工具。没有事实根据、无中生有、纠缠不清、目的不正的所谓“举报”已经不属于监督的范围了,而是一种伤害行为。

恶意举报带来的弊端和负面效应是深重的。首当其冲的是被举报者,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写说明、配合调查、自证清白上面,正常的办公秩序被打乱了,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另外,面对每一起恶意的举报,有关单位都要花费人力、物力去查证核实,这些被白白浪费掉的行政资源本可以用来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。

更遗憾的是,在员工遭到恶意举报的情况下,有的单位第一反应并不是辨别真假,而是先对被举报的人进行处理,希望能够“息事宁人”。如此做法看似暂时平息了事端,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,它以牺牲是非对错的底线为代价,动摇了人们对制度的信任。当教师因为怕举报而不敢批评学生、不敢正常管教,当公职人员因为怕举报而不敢依法履职、不敢秉公办事,最终受损的是公共利益。

对于恶意举报的情况,我们要采取果断措施,决不能让恶意举报者得逞。首先,组织要马上介入、主动调查、公开澄清,这是对当事人的保护,也是对公平正义的捍卫。组织不应让任何一个成员在正常的履职过程中受到不正当的打击,不应让认真做事的人流汗又流泪。

其次,要建立分级预警和分类处理机制。对于高频次、无实质证据、目的明显不当的举报,应当有一套专门的应对程序。例如,对于短期内多次举报同一对象的情况,可以要求举报人提供初步证据,没有证据的进行登记存档但不启动正式调查程序;对于举报人的明显是为了索赔、报复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的,应当进行约谈、列入信用观察,防止调查程序成为恶意举报者施压的工具。

再次,必须让恶意举报者承担相应代价。恶意举报现象严重的原因之一就是成本很低——举报人只要动动手,打几通电话,就可以让被举报者忙得焦头烂额。要改变“恶意举报零代价”的状况,使诬告者承担相应的后果。对于情节恶劣、造成严重后果的恶意举报要依法追责。

规范举报秩序并不是限制公民合法监督的权利,合法举报应当得到充分的保护,这是健康社会的基本要求。关键在于区分合理监督与恶意诬告的边界——前者基于事实、出于公心、旨在解决问题,后者捏造事实、出于私愤、旨在制造麻烦。只有把恶意举报者清退出去,合法举报的渠道才能更加畅通,举报制度的公信力才能得到维护。

